

中国道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

(纪念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

[上接 P1]

邓小平治国艺术初探

■ 陶武先



管子曾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邓小平民本唯上的治国艺术,诚在心,民唯上;诚在实,抓根本;诚在果,见成效。据此,能“故德交归焉”,民心必顺,国家必兴!

求实——在认识 and 实践中贯彻实事求是

治国求实,古人曾经论及。孟子提出办事情要讲“天时、地利、人和”,要善于“乘势待时”;《吕氏春秋》强调行事必须“顺其时,因其类”,“因性任物”、“以事适时”。这些都包含着“因势”践行的思想。在治国的实践中,邓小平在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基础上,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和发展。

邓小平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辩证的扬弃中实现了坚持和发展的辩证统一。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毛泽东,正确区分毛泽东的是非功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现实问题,敢于扬弃不符合时代现实的结论。比如,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虽然现实地反映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格局,但却高估了世界革命的形势,夸大了战争的危险性,将战争强调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唯一途径。邓小平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现状、关系、变化和趋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不拘泥传统的理论模式和结论,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针对战争的可能性,他认为,“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指出了战争并非解决政治问题的唯一途径。

在求实问题上,邓小平的治国艺术体现了一个“实”字,能够在认识 and 实践中将“实事求是”落在“实”处。

其一是明“实”。此处的“实”指“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求是”是一个由众多认识要素构成的系统,是一个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和实践不断往复的过程。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基础上,邓小平将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将实事求是建构为完整的、动态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进程;以“实际”作为“求是”的起点,让理论之“矢”命中现实之“的”,让所求之“是”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在事物动态进程中得到发展。在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简明概括基础上,通过解放思想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普及到全党和民众中,让人们明“实”;通过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解,形成各级干部、广大民众在大政方针上的共识,从而为“求是”治国奠定了可靠的思想基础。治国先治人心,治心先求共识,通过思想路线建构人们共识的基点,的确高屋建瓴!

其二是识“实”。此处的“实”指客观现实。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又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读懂中国这本书很不容易,特别是在刚刚经历了“文革”浩劫后正确认识中国现实就更不容易。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客观地认识和把握现实事物。无论是反对“两个凡是”,还是对毛泽东是非功过进行评价;无论是揭示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还是对特区改革开放作出估价,邓小平都坚持以“实”为基础,以“求是”为根本。他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质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质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相同,所以要独立思考”。“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实际情况这一条”。只有立足实际、独立思考才能“求是”。要获得“求是”的认识,必须在本质和现象的统一中把握事物,既善于把握事物本质的多样性,又善于在复杂现象特别是假象中揭示事物的“一级本质、二级本质……”。必须在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中把握事物,既看到“历史的今天”,又重视“今天的未来”,从而准确地把握事物的现实。必须在诸多矛盾的统一中把握事物,既看到主要矛盾又不忽视次要矛盾可能引起的主要问题,既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又重视敌我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所具有的非对抗性。必须在关系和过程的统一中把握事物,既看到事物关系所具有的规律性及规律本身的动态性,又重视过程链条中事物不断前进状态的复杂性。必须在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中把握事物,既看到客体对主体的限制,更注意发现主体超越客体限制的可能性。必须在批判和继承的扬弃中把握事物,既接受前人和他人可贵的认识成果,又敢于直面现实而扬弃错误的东西。善于在诸多统一中把握事物,明察秋毫,洞若观火,正确“求是”是从识“实”,是邓小平治国艺术在认识上的过人之处。

其三是务“实”。此处的“实”指现实的实践和目标。政治家是国家政治进程的统御者,必须将行动落实在现实的目标中才能有效地推进社会进程。邓小平治国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务实。针对背离国情的“一大二公”,他提出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论断,以此打破空谈理论的教条主义枷锁。他反对不解决问题、只讲形式、不求实效的文山

会海,“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无论是 1000 美元还是翻两番,邓小平具体地确定了国家的奋斗目标,“拿事实来说话”。在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新的概括时,邓小平提出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一最“务实”的理论要求,并进一步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为检验治国实践确定了可靠的尺度。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认识体现在实践中,将行动落脚于目标中,时时事事不偏离,这是邓小平“务实”治国的显著特征。

开拓——在决策 and 实施中体现善断创新

粉碎“四人帮”后,沉重的思想枷锁禁锢人心,众多的社会矛盾纵横交错,中国社会百废待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开拓性地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治国兴邦的英明决策,引导中国不断走向兴旺繁荣。从解放思想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经济特区,“一国两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两手抓”,军队服从整个国家建设的大局……这一系列重大的治国决策,决无前车之鉴,体现出改革开放所固有的开拓本质,闪烁着邓小平治国艺术的智慧光芒。

在开拓方面,邓小平的治国艺术体现为一个“新”字。“新”在前无古人具有开拓性,“新”在否定陈规具有创造性,“新”在义无反顾具有坚定性。

“新”在开拓性。开拓是在无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邓小平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特区谁也没搞过,邓小平决策搞起来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谁也没有试过,中国的香港、澳门运行了;让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和毛泽东没有说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做过,中国实践了!治国决策,重在开拓。开拓需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需要客观地总结提炼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需要有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邓小平在治国决策中所展示的开拓性,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特殊的时空条件:既无前者,也无借鉴,只有开拓才能在无路的条件下走出一条路来;另一方面,开拓性决策引导中国迈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治国兴邦之路。

“新”在创造性。创造不是无中生有,是现实基础上的实践升华。邓小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治国决策,无一不体现创造精神。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通过适合国情的制度创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奏响了 中国改革的第一曲凯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性的结合,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人类治国实践中“制度创新”的杰作。邓小平平治国决策的创造性,特色在“统一”。一是一般和特殊的统一,将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在现实有机结合起来;二是领导的积极性与群众的创造性相统一,不断将群众实践成果上升到理论和政策的高度;三是点和面的统一,既着眼面上的发展,又通过重点突破带动整体发展;四是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既吸收前人的理论和实践精华,又不失时机地总结现实的实践成果;五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既尊重客观规律和现实条件,又努力适应人民群众这一价值主体的目的和愿望。

“新”在坚定性。改革之事,历代皆有;但成功的改革屈指可数,原因在于改革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治国决策立志不坚,改革难免半途而废。苏轼曾说:“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邓小平在治国决策及实施中的显著特点就是坚定性,处变不惊,刚毅果断。深圳改革,曾引来多少不同看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致“平均主义”者的诸多不平。面对一系列阻力,邓小平对认准了的事坚定决心,持之以恒地抓到底。1992 年,邓小平在珠海考察时说:“我的决策还有一点用处,我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邓小平治国决策 and 实施的坚定性,来自对全局大势的深刻洞察,来自长期

积累的丰富经验,来自对决策科学性的正确把握,来自对改革无退路的深刻认识和义无反顾!

平衡——在改革 and 发展中把握稳变互动

中国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又是世界上伦理传统比较厚重的国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伦理型政治向法理型政治转化、不均质社会向均质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面临着体制变迁、行为失范、贫富分化、心理失衡、效率与公平等诸多矛盾的制约。要在稳定和发展、守范和改革、继承和超越之间找到适当切点,只有在治国实践中把握稳变互动才能实现社会的动态平衡。邓小平所提出的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的梯次推进战略、“三步走”的持续发展战略,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战略、强调政治稳定的改革战略,都在治国实践中追求着和谐的动态平衡,从而保持社会在总体上的稳定和发展。

在平衡方面,邓小平的治国艺术体现为一个“变”字,在变中推动社会的发展,在变中实现社会的稳定,在变中强调发展和稳定的平衡。

在变中推动社会的发展。从世界各国的改革历程看,变革思路不同从而效果各异。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邓小平采取的是变中求进的发展思路。变中求进才能推动发展。他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强调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统一,强调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中国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强调发展的必然性和急迫性,并通过“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从量上确定了发展的阶段目标。变中求进才能解决矛盾。作为丢失了先天优势的国家,经济发展的迟缓积累了许多尚待解决的社会矛盾;原有的结构及新旧体制的矛盾、科技文化落后的矛盾、人口增加与发展滞后的矛盾、沿海和内地不平衡的矛盾等等。只有在变革和发展中才能顺利地促进问题的分化,才能形成解决矛盾的优势,才能创造解决矛盾的条件,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有效手段。变中求进才能抓住机遇。邓小平曾有“机遇难得”、“要珍惜机遇”、“凡是遇到机遇就不要丢失”等论述,强调机遇的客观性、挑战性、可利用性。事实上,物价改革、国企改革、百万大裁军等改革的成功,都在于抓住了有利的机遇。反之,拒绝变革发展,不可能有任何机会!

在变中实现社会的稳定。改革是对原有规范和秩序的突破,必然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和可能。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社会失序,改革即会蜕变为一场灾难。邓小平在强调变革发展的同时,牢牢把握着这一大局,在变革和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一方面,他提出了稳定对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他抓住了社会稳定的根本是政治稳定,“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政策不变”、“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为了实现政治稳定,邓小平抓住了最核心的三条。一是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系统:“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二是强大的人民政权:“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三是广泛的政治参与渠道:“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三条,抓住了社会稳定的根本,显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在变中强调发展和稳定的平衡。要在变化中实现发展和稳定的动态平衡,难在发展不能有过荡,难在稳定而不出现停滞。这既是高水平政治驾驭能力的体现,也是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现实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邓小平一方面设计了渐进式的改革思路,即:先农村后城市,城乡互动,同步前进;先经济,后政治,政经协调,相互促进;先微观后宏观,上下呼应,综合配套;先试点,后推广,梯次展开,逐步深化;先易后难,创造条件,突破难点,带动全局。实践证明,这一条变中求进企稳的改革思路,是解决诸多社会矛盾的有效办法,是寻求发展和稳定动态平衡的正确选择,是实现中国社会改

革目标的短程线。另一方面,鉴于改革具体进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了顺利推进改革进程,邓小平提出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操作思路。对认准了的改革方向和确定了的发展目标,就必须有一股勇气,有一股劲,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同时,对具体的问题,要“走一步,看一步”,“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及时总结经验。“胆子要大”立足于正确的发展目标定位,“步子要稳”防患着可能的风险和曲折;两者结合起来,在变中实现了发展和稳定的动态平衡。

《墨子》曾言:“安危治,存乎上之为政也”。在变中巧妙地求得改革、发展、稳定的适度平衡,核心在于邓小平对稳变互动辩证关系的恰当把握。

辩证——在问题 and 矛盾中长于辩证施治

苏轼曾在《晁错论》中指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观念变革、资源配置、利益分配、规范构建,必然形成错综复杂的矛盾群,产生相互依存的问题链。改革中,有许多问题因其复杂性而成为两难选择,有许多矛盾由其多样性而具有悖论性质。双刃剑和怪圈型问题在改革中经常遇到,邓小平则灵活运用辩证法解决这类复杂棘手的问题。列宁曾说过:“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邓小平治国艺术的杰出之处,就在于抓住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在治国实践中长于辩证施治。

在对改革问题“辩证”施治时,邓小平的治国艺术体现了一个“活”字,“活”在有机结合,“活”在两手都硬,“活”在突出重点,“活”在因利制权。

“活”在有机结合。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一般和特殊的统一,由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既是认识的普遍规律,也是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过程。邓小平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催生了许多有奠基意义的治国实践,为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出了一条科学之路。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境外的资金、技术、经营管理方式相结合,缔造了伟大的特区实践。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建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的主权与资本主义的体制相结合,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一国两制”。针对我国与某些国家的领土争端,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法寻找双方的共同点。面对改革中棘手的问题,邓小平善于超越矛盾的原有对立而构建矛盾的新的统一,善于用非对抗的方式解决属于对抗性质的矛盾,善于超越正题、反题的限制而建构全新的合题。其精髓之处,在于将矛盾的同一和对立内在地结合起来。

“活”在两手都硬。事物都有两面,解决矛盾必有两手。邓小平在治国实践中强调两手都硬。比如,一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社会稳定;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治国决策,使我们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和整体协调。这一治国之举,“活”在两手齐用而具有必要的张力,“活”在两手协同而保持动态的统一,“活”在两手“都硬”而致力适度的平衡。

“活”在突出重点。毛泽东曾指出:“对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的重要方法之一”。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突出重点,是邓小平治国决策的重要方略。依据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贫穷落后的现状,邓小平强调中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由此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全党全国的首要任务。从中国国情出发,他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发展重点。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他始终把企业改革作为中心环节。在提高社会成员经济收入过程中,他强调让一部分人、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发展多

种经济成分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运用多种分配形式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重点和区别在这些方针政策都得到了明确的体现。突出重点,邓小平的治国艺术“活”在对事物不平衡本质的深刻理解,“活”在善于科学地把握重点,“活”在准确及时地把握重点和非重点的相互转化,“活”在通过非均衡发展逐步实现社会均衡。

“活”在因利制权。因利制权是《孙子兵法》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意即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在治国实践中,邓小平提出了许多因利制权的思想。他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鉴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他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他通过支持和鼓励讨论来分清理论是非;而对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的不同看法,邓小平的办法是“不争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抓紧时间干,通过干的实际效果来评判是非。在苏联剧变条件下,他根据国际形势提出了“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的英明决策。因利制权,邓小平“活”在辩“利”,能够区分对我的有利无利、大利小利;因利制权,“活”在制“权”,治国本无定势,“先知迂直之计者胜”。只有因应客观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相应对策,才能把握治国的主动权。

《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邓小平辩证施治的治国艺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既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得以顺利推进的治国之道,也是我们不断认识和有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树立了光辉典范。

- 引用书目: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 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7.1
 -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 告》1997 年 9 月 12 日
 - 3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3.252
 - 4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3.105
 - 5 叶光大、方万寿、黄涤明、袁华忠译注: 贞观政要译注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22
 - 6 叶光大、方万寿、黄涤明、袁华忠译注: 贞观政要译注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89
 - 7 叶光大、方万寿、黄涤明、袁华忠译注: 贞观政要译注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238
 - 8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3.4
 - 9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3.178
 - 10《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 出版社,1991.1079
 - 《管子·牧民》
 - 11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3.59
 - 12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3.260
 - 13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3.261
 - 14 苏轼:《东坡全集》卷(五十四·奏议十八 首)、《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影印古 籍,《乾隆御览四库全书荟要·集部》
 - 15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3.284
 - 16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3.216
 - 17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3.251
 - 18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3.266
 - 19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3.370
 - 20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3.168
 - 21 陈宜民等译注:中国古代格言大全[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324
 - 22 袁梅、刘焱等译注:古文观止今译[M]. 济南:齐鲁书社,1983.905
 - 23 列宁全集(第 43 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0.369
 - 2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 出版社,1986.167
 - 25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3.323
 - 26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3.374
 - 27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 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7.63
 - 28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 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7.50